
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

潘忠黨

摘要

架構分析 (framing analysis) 亟需理論的澄清與整合。為此目的，本文討論了架構分析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命題，試圖澄清「框架」(frame) 和「架構」(framing) 的概念。在此基礎上，本文綜合、分析了新聞架構研究三大範疇的文獻：框架在新聞中的呈現，架構效應及其心理機制，架構在話語行動中的結構作用。本文提出，架構分析是一個關於人們在建構社會現實中如何交往的研究領域，為研究我們如何展開公共生活，提供了一個動態的整體考察「思」、「言」、「行」的思路。

關鍵詞：框架，架構，架構分析，話語，公共商議，社會建構主義

潘忠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森分校博士) 為威斯康星大學—麥迪森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傳播藝術系教授。他的研究興趣為政治傳播、輿論和中國的傳媒改革。他曾任教於美國康奈爾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電郵：zhongdangpan@wisc.edu

Framing Analysis: Toward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PAN Zhongdang

Abstract

Framing analysis needs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For this purpo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oblematics of framing analysis, explicates the concepts of “frame” and “framing,”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literatures in three areas of news framing analysis: frames and framing in news representation, framing effects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public life via framing. Synthesizing the literatures in these area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raming analysis is an area of research on how people inte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It offers a uniqu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at considers cognition, discourse, and practices in an integrated dynamic.

Keywords: frame, framing, framing analysis, discourse, public deliber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ism

引言

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架構分析 (framing analysis) 都是一個理論混沌的研究領域。¹ 自從美國政治學家恩特曼 (Entman, 1993) 將其概括為「破裂的範式」(fractured paradigm) 之後，不少學者都試圖整合文獻，以提出一種「架構分析理論」。但是，這些努力至今成效甚微，乃至最近有人說 (D'Angelo, 2002)，架構分析其實是個多範式的研究課題 (research program)，理論和方法上的多元是其應有的特徵。

這種開放、多元的趨向很有益，但它並不能解決基本概念混亂的問題。綜觀迄今為止的文獻，架構分析確實涉及多個學科和多種取向，學者們的看法五花八門。有人區分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兩大學科傳統 (Pan & Kosicki, 1993)；有人區別認知心理學、建構主義和批判理論這三種理論範式 (D'Angelo, 2002)；還有人從方法入手，將架構分析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將框架作為因變數，考察其建立的過程，另一類以傳播內容中的框架作為「自變數」，考察它如何影響人們的認知、態度和行為 (Scheufele, 1999)；甚至有人將架構分析看作「議程設置理論」的延伸，是所謂的「第二級議程設置」(second-order agenda-setting) (McCombs, 1997)。

理論的渾沌與研究問題的雜亂直接相關。運用「架構分析」的語言，有人考察新聞媒體如何報導某一事件或議題 (如 Lee, Chan, Pan, & So, 2002; Miller, 2001; Semetko & Valkenburg, 2000)；有人探討新聞框架對受眾個人的認知與態度所產生的影響 (如 Cappella & Jamieson, 1997; Druckman, 2001; Haider-Markel & Joslyn, 2001; Iyengar, 1991; Kellstedt, 2000; Kinder & Sanders, 1996; Nelson & Oxley, 1999; Price, Tewksbury, & Powers, 1997; Shah, Domke, & Wackman, 1996; Valkenburg, Semetko, & de Vreese, 1999)；有人分析一個公眾議題的內涵演化 (Gamson & Modigliani, 1989; Miller, 1997) 及其政策與意識形態意義 (如 Entman, 2004; Gitlin, 1980)；還有人研究公眾如何理解和談論公共生活中的議題，並以此而參與公共生活，包括形成集體行動或社會運動 (Benford & Snow, 2000; Gamson, 1992; Gamson & Meyer, 1996; Iorio & Huxman, 1996; Neuman, Just, & Crigler, 1992; Pan & Kosicki, 2001; Snow & Benford, 1992; Steinberg, 1998)。在認知心理學領域，學者們早以「框架」的概念研究論斷與決策的

形成(如Kahneman & Tversky, 1984; Küberger, 1998)。澄清「架構分析」的理論脈絡，也就是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覆蓋如此廣闊的眾多研究問題之間，究竟有沒有邏輯的關聯？或者說，這眾多問題所指向的核心命題究竟是什麼？

以上的簡述已經表明，雖然「架構分析」並非源自傳播學，卻已成為傳播學的核心關注點之一。可是，經過20多年的努力，傳播學對「架構分析」的理論貢獻甚微，引入「架構分析」也並沒有引發傳播學內的理論突破。如何進行「架構分析」，以及「架構分析」作為一種理論和方法的取向適合回答什麼樣的研究問題，仍然很模糊。

因此，靜下心來對「架構分析」作一番理論的梳理和澄清是傳播學者亟需做的事情。這是我寫本文的動因。我的目的是就「架構分析」發一家之言，以期對「架構分析」的理論邏輯和研究取向作一個整合式的探討。為此，我需要回顧文獻，但更需要分析文獻，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整合文獻。為了將本文涵蓋的內容限制在可處理的範圍內，在澄清基本概念的基礎上，我將集中討論以新聞(廣義而言的)為基本再現形態的架構過程。

架構分析的核心命題

採用「框架」這一概念的學者，通常會引用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Goffman, 1974)的《架構分析》(*Frame Analysis*)一書。戈夫曼在該書的導言中，清晰地表達了他的核心命題：他遵循奧裔美國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阿爾夫雷德·舒茨(Schutz, 1962)的現象學思路，關注人們如何建構現實一隅(one realm of reality)，或「意義的一個特定範疇」(one finite province of meaning)；他與美國社會學家、民族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的創始人哈若德·伽芬克爾(Garfinkel, 1967)一樣，希望探尋人們建構某特定現實所遵循的規則。簡言之，戈夫曼關注人們如何提出並解答在任何具體情景下都必然遇到的問題，即「現在發生的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也就是試圖理解人們如何組織經驗，從而賦予它們特定的意義。

也就是說，戈夫曼要解答的是人們如何建構社會現實這個問題。這是社會建構主義學說的核心命題(Berger & Luckmann, 1966)。戈夫曼進

一步分析道（雖然他沒有用這樣的辭彙），如此理解的社會現實建構過程就是交往（或稱傳播）的過程，²「架構分析」就是一個關於人們在建構社會現實過程中如何交往的研究領域。他繼續指出，他所運用的框架一詞與葛列格裏·貝特森 (Bateson, 1955) 的一篇論文中對該詞的使用最為接近。貝特森在這篇論文裏提出並探討的問題是，動物（包括了人類）為什麼可以在不同情況下將同樣的物化記號用於不同內容的交往互動？促使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一項非常具體的觀察：在三藩市動物園，他看到兩隻年輕的猴子在「遊玩」，即它們相互採取了一系列看似打鬥卻並非打鬥的動作。問題是，如果物化的表徵——動作——與打鬥沒有什麼區別，那麼，參與遊玩的猴子以及他（貝特森）這個人類觀察者何以明白它們並非在打鬥，而是在遊玩呢？貝特森提出，顯然，遊玩的參與者和觀察者都具有進行「元傳播」(meta-communication) 的必要能力。

所謂「元傳播」，指的是傳播者在傳播活動中，就如何詮釋所用符號而相互傳遞信號。這些信號可能包含了特定的資訊，即「目前採用的記號並非它通常所指的意義」。因此，貌似打鬥的行動——記號——並非它們通常的指代（打鬥），而是其他以類似形式所表達的活動（遊玩）。更廣義地看，要使傳播成為可能，必然要有將符號與意指相聯繫的規則，也需要一些規則，以認定並管理參與符號交換的個體之間的關係。這些規則通常在語言這個體系之外，是行動場景所附加的，通常是不言而喻的。對此，貝特森打了個比方：地圖是有意指潛力的符號系統，地圖所描繪的地域是被指，連接這兩者的是約定俗成的規則，包括形成製圖者與閱圖者角色及其相互關係的規則。地圖之所以能在兩者之間傳遞同一指代，關鍵在於雙方採用了這些共用的規則。

也就是說，貝特森指出，任何一個傳播活動，同時在傳遞由三個元素構成的資訊組合：(1) 感官刺激的記號，(2) 此記號的指代，(3) 區別此指代與其他指代以及參與者必須採取的對應行動的規則。這第三項就是「元傳播」的內容。「框架」(frame) 是元傳播層面的資訊，是傳者提供給受者應當如何理解符號的詮釋規則。傳播之成為可能，必要有這個層面的傳—受共享。「框架」因此是個心理學的概念，類似於「場景」、「鏡框」；類似格式塔心理學內的「格式塔」，它將所包含的元素以一定的邏輯前提予以組合。

這些討論，還需要加入現代社會公共生活的複雜元素，³其中最主要的是規模(即不僅限於兩位個體之間或小群體內的交往)、中介(包括媒體以及集體記憶的儲存系統，如圖書館)，以及對社會和中介的組織(國家、市場)與控制。將這些因素考慮進來，從社會建構主義的基本思路，我們可以延引出以下幾個基本觀點，其中包括了舒茨(1962)的論述和哈貝馬斯(Habermas, 1984, 1987)「交往行動理論」的基本觀點，還反映了當代社會理論向語言學的轉向，也就是對話語及其實踐的關注(Fairclough, 1992)：⁴

第一，社會現實是人們經過社會行動和互動而建構的。架構分析是對人們如何建構社會現實——裁選和詮釋現實生活的某一部分，將之置於某特定意義體系內——的分析。這也意味著架構分析在方法上更易步入詮釋社會行動的意義(相對於行為主義的解釋)這一邏輯軌道。

第二，社會現實的建構源自建立共同生活場景的需要，通過交往互動發生，並在此過程中實現社會現實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 即由相互主觀而構成的外在性)。架構分析考察的是人們如何遵循話語或敘事建構的某些具體規則展開交往行動，從而實現在具體行動場景下對情景的共同定義。因此，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在架構分析當中佔據突出位置。

第三，發生在現實的政治經濟場景中，這種建構現實的話語或敘事活動表現為話語的爭鬥(discursive contestation)，即討論和爭辯。架構分析必須考察爭鬥的過程，並在規範和經驗兩個層面同時展開。在規範的層面，架構分析需要看到話語爭鬥必須對市場邏輯與國家權力展開抗爭(參考哈貝馬斯關於系統對生活世界的「內部殖民化」的論述)；在經驗層面，架構分析必須看到市場與權力對公共領域的異化，對交往行動的扭曲(參考哈貝馬斯對工具理性侵蝕或取代交往理性的論述)。因此，架構分析將話語及其建構作為在政治經濟場景下的社會行動來考察。

第四，在公共領域發生的話語爭鬥，亦即架構的過程，是民主社會中人們公共生活的核心組成部分(Gamson, 1988; Pan & Kosicki, 2001)。架構分析就是考察人們如何展開公共生活，它是在廣義的政治傳播研究领域內研究商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一種重要分析手段。⁵

架構分析的基本概念和邏輯

架構在象徵互動視角下的含義

戈夫曼的「架構分析」部分地建立在這種元理論的基礎之上。他指出，人們的日常活動隱含或使用了特定的詮釋框架，它在特定行動場景下意義自明，卻使原本渾沌的情境變得具有某種意義。⁶ 框架雖然內部組織程度不同，但任何一個框架都為我們提供了某種理解、思路或視角，形成「詮釋的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令我們「以之分辨、覺察、確認和命名似乎無限多的具體事變」(Goffman, 1974, p. 21)。框架為我們提供了處理——包括篩選和組織——觀察「素材」的前提和規則，猶如鏡框，劃出內外的界線；猶如故事展開的路徑，從無限的大千世界中抽離出相關的元素，組織成故事。戈夫曼將此過程描述為從延綿不斷的活動溪流中裁選出現實的「截片」(strip, slice)。

在任何情景下，我們都有可能同時使用多個不同的框架（對現實的不同組織，或不同經驗），或採取不同的視角 (perspectives)。但是，在任何一个行動的具體情景下，總是有某一個框架位於「前臺」，將符合於它的現象凸顯在行動者的視野內。框架的選擇是行動的內容之一，發生在行動者的意識範疇內。行動者選擇某一框架，也就是排除了其他框架，突出了所面臨情景的一些特徵，為之提供了基本的定義，並因此限制了可選擇的行動類型。在這個意義上，詮釋的框架就是現代認知心理學中所講的認知「基模」(schema，又譯「圖式」) (Carlston & Smith, 1997)。

行動者在選擇了某框架並在其意義範疇內採取行動，他者——無論僅僅作為觀察者還是同時也作為互動方——可從該行動中解讀到意義，並採取同樣的框架應對，互動或協調行動由此而產生。戈夫曼認為，這其中有一個轉換的過程。為分析這個過程，戈夫曼提出了「基調」(the key) 這個架構分析的核心概念，他說 (Goffman, 1974, pp. 43-44)，所謂基調，「就是一些特定的常規，通過它們，在初始框架中有意義的某活動被轉換成為以它為藍本但為參與者看作另外的活動。這個轉換的過程即為調音」(keying)。根據戈夫曼的分析，貝特森觀察到的動物間貌似打鬥的遊玩，就體現了兩種活動的轉換，並以此形成了對打鬥與遊玩的場景獨特的共同理解。

架構在預期理論視角下的含義

從事架構分析的學者們也經常引用心理學家凱尼曼 (Daniel Kahneman) 和特威爾斯基 (Amos Tversky) 的決策研究 (Kahneman & Tversky, 1984; Tversky & Kahneman, 1988)。這兩位心理學家承襲的是實證主義的認識論，也就是說假設了可以客觀認定的事實以及規範的理性模式，因此，他們與社會建構主義者有認識論上的根本區別。但是，他們的架構效應理論與戈夫曼的理論並非毫無關聯。

凱尼曼與特威爾斯基在決策研究中所考察的現象之一是所謂的架構效應 (framing effects)，即同一組資訊經由不同的表述導致不同的決策選擇。以下是最常被引用的一個案例 (Kahneman & Tversky, 1984)：

情境設想：美國受某亞洲流行病的侵襲，該病可能導致600人死亡。

決策問題之一 (152位被試者)：

現有兩種方案：採用方案A將令200人獲救；採用方案B，600人全部獲救的可能性為1/3，無人獲救的可能性為2/3。請問你傾向採用哪種方案？

結果：72%的人選擇方案A。

決策問題之二 (155位被試者)：

現有兩種方案：採用方案C將會令400人死亡；採用方案D，無人死亡的機率為1/3；600人全部死亡的機率為2/3。請問你傾向採用哪種方案？

結果：78%的人選擇了方案D。

通過這個案例，凱尼曼和特威爾斯基顯示，對預期值相等 (稱為資訊對等) 的不同方案，純粹由於提問的方式 (即陳述的框架) 不同，人們會有不同的偏好，並因此作出不同的決策選擇。對第一組被試者，以「得」(獲救) 的框架陳述資訊，導致決策中風險規避 (risk aversion) 的傾向；對第二組被試者，以「失」(死亡) 的框架陳述資訊，導致決策中風險尋求 (risk seeking) 的傾向。

這種架構效應，凱尼曼和特威爾斯基分析道，其實是「價值函數」(value function)——對回報預期的心理感受——因為陳述方式不同而發

生變化的一個表現，是他們的預期理論 (prospect theory) (Kahneman & Tversky, 1979; Kahneman, 2003) 所預測的現象之一。簡單地說，預期理論提出，人們的認知理性是受限的 (bounded rationality)，其表現之一是人們對「得」與「失」的心理感受與實際價值呈不對稱的S-型關係，稱為「價值函數」。「得」帶來愉悅 (正面價值)，因此導致人們的保守 (風險迴避，如守財) 傾向；「失」帶來痛苦 (負面價值)，為免除這痛苦，人們會顯示出冒險 (風險尋求，即賭一把) 的傾向。但是，這種感受有靈敏度遞減 (diminishing sensitivity) 的趨勢。「得」的價值函數遞減幅度大 (遞減曲線呈緩坡上凸)，「失」的價值函數遞減幅度小 (遞減曲線呈急坡下凹)。造成這種對相同實際價值有不同心理感受的原因，在於陳述框架預設了不同的心理參照 (reference state)：問題一的參照是600人會死，因此，能救一人，就救一人；問題二的參照是無人會死，因此，能保持這狀態，就保持它。可見，兩者的背後是同一驅動力，即人的驅利傾向，但這傾向會因場景不同而有不同表現。

這個簡單綜述顯示，凱尼曼和特威爾斯基用了不同的語言，通過對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偏離規範型理性模式的考察，分析戈夫曼提出的問題，闡述的是同樣的基本原理，即人們採用不同的認知框架體驗現實 (表現為價值函數)，並據此而行動 (選擇)，建構出特定的現實 (選擇的後果)。反映這個邏輯關聯，實驗資料顯示，只要被試者有機會反思他們自己的偏好、思考不同選擇之間的因果關聯、試圖運用不同的框架分析所呈現的資訊等，「得」與「失」的架構效應就可能消失、降低或改變方向 (如：Jones, Frisch, Yurak, & Kim, 1998; Jou, Shanteau, & Harris, 1996; Miller & Fagley, 1991; Küberger, 1995; Takemura, 1994)。換句話說，在考慮某一問題時，決策者有可能在認知上超越某一框架，或者採取不同的框架，對現實作出不同的裁選。

新聞架構分析

新聞架構分析在以上基本理論框架中添加了其他必要的元素，即前一節提到的公共生活的基本現實特徵。它既繼承又超越了上述兩個傳統，形成了多學科和多取向交叉的領域。它的基本理論觀點是，(1) 意義

在傳播 (或交往) 的過程中得到建構，(2) 傳播活動是使用表達載體的社會行動，構成一個社會的符號生產領域；(3) 但是，它發生在由物質生產構成的實體場域；(4) 因此受到規範該場域的公共利益原則以及政治與經濟的邏輯之間的張力制約 (Hilgartner & Bosk, 1988)；(5) 位處特定歷史、經濟和政治座標點的社會個體或團體達成其特定理解或意義所遵循的認知和話語的組織原則，就是他 (她) 們的「框架」。

這個定義是對多位學者論述的總結。比如，美國傳播學者斯蒂芬·李斯 (Reese, 2001) 定義說，「框架是一個社會共用的、時間上顯得穩定的、可以用象徵手段將社會世界有意義地結構化的組織原則」(p. 11)。據此，框架构成行動者觀察世界的視角，思維推理的前提，裁選現實素材的模式，以及傳播行動中的組織話語單元的核心思想 (Gamson, 1988, 1992; Gamson & Modigliani, 1989; Gitlin, 1980)。由此，架構即為這樣的過程，在其中，人們「選擇感知到的現實的某部分，將它們凸顯在傳播的文本當中，以此宣導關於被描述現象的某種問題定義、因果解釋、道義評估，以及處理方法」(Entman, 1993, p. 52)。簡單地說，框架具有預警、診斷、道義評判和處方的功能 (Gamson, 1992)。因此，恩特曼更進一步說，框架有四個棲身之所：傳播者的認知、傳播者建構的文本、文本接收者的認知和傳播活動與文本流通的場景——文化。

這些對「框架」以及建立並使用框架的過程——架構——的討論，都是在分析人們的意識或認知與其社會行動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們不應將源自社會學的架構分析與認知心理學對於人們如何處理資訊、獲取知識、形成態度或作出決策的理論割裂開來看待。社會建構主義的「架構」觀點假設了個人的認知過程，即認知內部呈現的結構性以及理論 (觀念) 對人們處理資訊的組織作用 (Pan & Kosicki, 1993)。這些假設就是認知心理學家們一直在考察的認知呈現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和資訊處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機制。為考察由這兩部分組成的認知過程，心理學家們提出、定義並使用了一些與「框架」一致的概念。比如，一些研究人工智慧的心理學家在探討如何以電腦模擬人的大腦的知識儲存和使用時，就用了「框架」這個概念，將它定義為資料 (在這個領域，data 即 information) 的結構模板 (template)，起到將眾多單位的資訊分門別類地組織成更大知識單元的作用 (Minsky, 1975)。更進一步，有學者認為「框

架」是人們認知中的穩定組合，它確認某類現象（可以是一類物件、一類行動、或一類社會關係）的根本特徵，律屬該類的個體在這些特徵上不同的賦值，以及二者之間的聯繫 (Barsalou, 1992)。指代這種「資訊組合的穩定結構」的概念包括「基模」、「腳本」(script)、類別 (category) 或原型 (prototype)，以及將類別或原型固化並且摻入道義和情感評判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 (Carlston & Smith, 1997; Macrae & Bodenhausen, 2000; Schank, 1990; Smith, 1998; Taylor & Crocker, 1981)。⁷ 在對人們的推理以及決策過程的研究中，框架就是組織資訊並因此而引導思路、終至影響人們決策的範本，架構就是以特定範本組織資訊、分析問題的建構過程 (Kahneman & Tversky, 1984)。

新聞架構分析的三大範疇

新聞架構分析關注的是人們在公共生活中如何建構意義。理論上它強調建構的過程與動態，考察並解釋社會行動者的話語和話語實踐；分析取向上它要求採取各種分析方法，對行動者、行動、行動的場景、行動的方式、動因或後果採取相互關聯的考察 (參照Burke, 1989)。雖然一項實證研究提出的問題通常集中於這其中的一、兩個要素，但也需要將該問題作為這個動態整體的構成部分來處理。

在此視野下，架構分析可分為三大範疇：話語（文本為再現的體系），話語的建構（框架建構的行動及過程），以及話語的接收（效果及其心理機制）。在社會建構主義的學理框架內，每個範疇都是動態的過程，都以行動及其場景為構成元素 (Fairclough, 1992)；它們相互之間也是互動的關係 (van Dijk, 1988)，構成公共生活的動態整體 (Pan & Kosicki, 1993)。因此，區分這三大範疇，只是為了組織理論探討，反映不同實證研究可選擇的分析重點。

確認框架的不同途徑

無論具體的實證問題屬於哪個範疇，研究者首先要確認框架。文獻中對研究者確認和考察的各種框架有多種分類（如：Druckman, 2002;

Kühberger, 1995; Levin, Schneider, & Gaeth, 1998)。⁸ 這些分類體系各自都不完整，因為它們都沒有從分析框架和架構的概念出發，以邏輯演繹法，分析在新聞和公共表達中的實踐行動，並以此提出分類的層面與標準，因此它們無法顯示不同架構途徑或類別之間的理論關聯。

前一節的概念分析為確認框架設立了一些基本原則：(1) 針對所考察的具體問題或現象(如：現實生活中人們需要分析、討論的議題，需要形成的決定，需要完成的任務(task))，(2) 符合並被認為符合行動者履行其社會角色的行動邏輯(如：製作新聞，表達一個觀點或一種利益，宣傳一項政策建議或推行一項政策)，(3) 選擇或彰顯資訊(或資料)的組織(即交往行動)原則(即區別於提供新的資訊或有說服力的論點)，(4) 採用象徵(或顯意)的手段，包括運用和組織符號的句法結構(syntactical structure)。

顯然，根據這些原則，具體的框架因為行動者、問題、行動場景等的不同而千變萬化。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足夠的研究積澱而形成完整的分類體系，也就是說，我們仍缺乏對架構這一社會實踐動態的充分理論認識。就新聞架構分析研究這個比較局限的領域來說，文獻中有如下四類框架：⁹

1. 美國政治學家阿岩伽(Iyengar, 1991)根據新聞報導的文本組織手段，區別主題式框架與片段式框架(thematic vs. episodic frame)。主題式框架指的是以一個命題為核心，對某一類新聞現象運用系統的資料(如政府機構的統計資料)和全面的概括予以報導；片斷式框架體現為以講述一個(或數個)具體個人或事件的故事而報導該類新聞現象。雖然阿岩伽的研究將選民個人對社會現象的因果解釋，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策支援傾向，與他們對新聞內容的接觸聯繫起來，啟發了學者們對民意、傳媒效果等的思考，但他對框架的定義與區分缺乏理論內涵，與話語及其建構沒有理論連接，他的研究結果非常單薄，他對傳播過程本身基本沒有理論興趣。因此，這條思路的研究前景不佳。
2. 言說者(包括新聞從業者)在敘述或討論某一現象或議題時，對不同相面或內容的強調程度會不同。根據這種強調相面的區別，研究者可確定不同框架的使用。這種方法，被稱為「側重架構法」(Druckman, 2002)或特徵架構法(Levin et al., 1998)。比如，新聞

媒體在報導競選或政策討論時，側重點可能是政治運作的策略或競選/討論所關注的議題、理念和政策構想。前者被稱為「策略框架」(strategy frame)，後者被稱為「議題框架」(issue frame)；前者被認為會導致公眾在政治上的玩世不恭，包括將民主政治看作一場毫無實質意義的遊戲，後者被認為會導致公眾吸納民主政治中涉及的資訊、議題和原則，並據此形成政治態度 (Cappella & Jamieson, 1997)。這條思路的研究，反映了媒體——尤其是電視——時代美國民主政治的一些表象；這兩個框架概括了政治實踐中行動者的一些表現。但是，這兩個框架過於宏大、內部雜蕪，不僅在實證研究中難以測量，而且其內涵過於不確定。尤其是，策略與議題在民主政治的實踐中並非水火不相容，從民主政治的參與中得到履行使命的嚴肅感與獲取娛樂的刺激和滿足感並非相互排斥。因此，這條思路的研究，雖會導致很有意義的媒介批評，但不構成新聞架構研究的主流。

3. 第三類與第二類有重疊之處，即認為框架是言說者敘述或討論某一新聞事件或議題時的側重。但與第二類明顯不同的是，側重的形成在於言說者在組織材料時所倚賴的基本價值觀念或原則，或對所呈現材料在原則層面所作的概括。因此，它關注的是資訊組織原則的不同，而非內容構成比例的不同。這一大類下還可分兩類。一種是政治價值觀(如：報導三K黨人示威活動時以言論自由或公共秩序作為組織材料的基本原則；Gamson & Modigliani, 1989; Kinder & Sanders, 1996; Nelson, Oxley, & Clawson, 1997; Shah et al., 1996)。另一種是新聞生產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基本新聞價值觀，包括衝突、人物、戲劇、後果等 (Price & Tewksbury, 1997)。這兩者之間有區別。首先，前者關注的行動者主要是利益或政治觀點的表達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團體的代言人；後者關注的行動者主要是假定應超越特殊利益的新聞專業人士。對不同行動者的社會角色的理論假設，成為確認與區分架構的考慮因素之一。其次，採取前一種途徑，不同的現象或議題必然有不同的框架；採取後一種途徑，也許同樣的一組新聞價值觀會成為不同議題或現象的框架基礎，有人甚至聲稱由此確認的是新聞的

「基因框架」(de Vreese, Peter, & Semetko, 2001)。就目前的文獻來看，大多數架構研究採取了這種確認組織原則的途徑，但其中的這兩個分類如何關聯仍然有待澄清。

4. 第四類框架指的是以不同隱喻所建構的思路 (Schlesinger & Lau, 2000)。這個分析途徑的基本邏輯是，隱喻構成穩定的思維格式，它是我們對所熟悉的現象(經常來自直接的生活體驗)所作的抽象，存儲於我們的記憶系統，沉澱於我們的語言當中。隱喻式思維是我們面對千變萬化的世界所「自然」採用的思維捷徑，其基本特徵是個體根據自己熟悉的現象，構成思維格式，並將之「嫁接」到所不熟悉的領域 (Lakoff & Johnson, 1980)。任何一個複雜社會現象或公共生活中的議題，都可能適宜採用多個不同的隱喻；這種不同，導致了思路的不同、認知的不同，以及交往行動(包括採用的語言)的不同 (Lau & Schlesinger, 2005)。這個研究取向，引入了認知語言學的傳統，是目前架構分析領域最新也最引人注目的發展。

有了這個基本的「地形圖」，我們現在可以討論架構分析的三大範疇及其相互之間的聯繫。我比較青睞上述第三、四種取向。原因在於，它們與前一節對架構的定義有邏輯上的演繹關係。因此，我以下的討論重點在於分析採用這兩種取向的研究。

架構在話語結構中的沉澱

架構研究將分析文本作為核心內容之一 (Pan & Kosicki, 1993)。但作為一個動態、整合的研究領域，它不把文本作為孤立的系統來考察，而是在社會行動和社會關係的場景中考察文本，因此它既不假設意義已被客體化在文本這「容器」之中，也不否認文本對人們認知和行動的制約力量。¹⁰ 這裏講的話語分析，關注的是言語活動，是語言的社會使用，而不是語言或其他符號體系本身。

就目前的研究文獻看，如何實證地考察話語的文本，仍是架構分析的瓶頸。很多考察新聞媒體如何報導一個議題或現象的研究，重點自然在分析文本，但是，往往不考慮所分析的是什麼行動者在什麼場景形成

的話語，因此，這種對新聞文本的框架分析，很少超越簡單的描述。我們可以將文獻中歸納得到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分析目的和對架構理論的不同理解，分為兩大類：

- (1) 搜尋或抽取新聞文本中的各種「框架」，方法是內容分析(如，Tankard, 2001; de Vreese et al., 2001; Semetko & Valkenburg, 2000)；
- (2) 探詢文本中記載的不同言說者，他們對不同框架的青睞，包括表達和提倡，以及他們之間的架構之爭(如，Miller, 2001; Gamson & Lasch, 1983; Gamson & Modigliani, 1989)。

因為篇幅限制，我無法細加評述每一方法。因為甘姆森的方法最符合本文所表述的架構的概念以及架構分析的核心命題，因此，我在此略多作討論。

甘姆森(William Gamson)在分析公共話語——即由某特定社會行動者宣導、在公共場域流通、關於某公共議題的文本——時，將「框架」定義為一個話語單元的「核心組織觀念或故事脈絡」，它不僅使與該議題有關的事件具有意義(make sense)，而且確定了議題的性質，並邏輯地推導出一些「顯而易見」或「符合邏輯」的處理對策。作為「核心組織觀念」，框架還決定了符號表達手法的選擇，如機智的隱喻、典型的案例、醒目的形象、生動的描述和流行的辭彙。甘姆森認為，這三種元素——框架、顯意手法和處理對策，構成公共話語的物化形態，他將之稱為「話語包」(discursive package)，即論說某一議題的一個意義體系。

綜觀甘姆森和他的合作者們發表的一系列論著，我們可以將他的方法總結為三個步驟：(1) 選擇有爭議的重大社會或政策議題，大量閱讀各類媒體刊載的關於該議題的文本，(2) 在此基礎上，將這些文本解構成話語包的構成元素，經過提煉、歸納，再重構成「簽署矩陣」(signature matrix)，(3) 在對每類「話語贊助者」的歷史和社會學分析的基礎上，詮釋「簽署矩陣」，揭示深埋其中的意念結構(或觀念的星座)——即意識形態。

「簽署矩陣」呈現的是特定時期內公共話語的基本構成。在這結構的核心起著組織作用的是「框架」。由它所邏輯地制約(即導致言說者從事特定的選擇)並表達它的是「簽署手法」(signature devices)，包括隱喻、範例、流行語、描繪、視覺形象；邏輯推理的「簽署手法」包括根源、後果，和原則訴求。

解構的過程包括了量化(如：某一流行語出現的頻率)和質化(如：在解讀基礎上確認一個「框架」及其「簽署手法」)的手段，重構的過程亦然(如：某一話語包在不同媒體或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頻率)。運用這個話語分析的方法，甘姆森和他的同事們考察了大量議題的話語構成(Ferree, Gamson, Gerhards, & Rucht, 2002; Gamson & Lasch, 1983; Gamson & Modigliani, 1989)。

這個方法要求量化的內容分析與質化的文本解讀相互補充，而且特別關注分析方法與話語及其建構的相關理論之間的契合。因此，它是目前各種方法中最值得提倡的。但它操作起來複雜，對其中很多環節(如：簽署手法的編碼程式、簽署手法與框架之間的組合等)，甘姆森語焉不詳，其他學者在採用中難以統一。更重要的是，為運用這種方法，研究者需要對議題及其相關的社會行動者做歷史的和社會學的詳盡考察，以此建立研究者解構文本所必需的知識背景。研究者需要建立深厚的民族誌式的(ethnographic)知識背景，提高在此基礎上的敏感度。研究者在這兩方面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分析的效度和深度。

架構效應及其心理機制的模式

考察架構的效應是架構分析的關鍵問題之一。綜觀目前的文獻，已經考察的效應包括很廣的範圍。繼承凱尼曼和特威爾斯基的傳統，心理學家們考察了不同領域內的決策選擇、對不同選項的態度和評判、對採取某種行動以實現某具體目標的態度(Küberger, 1998; Levin et al., 1998; Rothman & Salovey, 1997)。¹¹ 這些研究所反映的一些理論觀點，直接幫助我們理解公共生活領域的架構效應，其中最主要的是，通過對一個問題的資訊的組織，框架(1)影響人們的觀察角度和思路，(2)引發人們對現實的不同判斷(如：選項的風險概率、選項之間的預期結果是否對等或有差異、某一選項與其預期效果的價值衡量等)，(3)也導致人們在完成判斷或決策中對不同原則和其他認知因素的適用性和/或重要程度的判斷(Frisch, 1993)，(4)並最終影響人們對不同選項以及採取某種行動的態度，以及作出不同的決策。

這些觀點所概括的，是在不確定情境下，人們的「直覺判斷和決策」

的基本特徵，描述了人們的理性局限 (Kahneman, 2003)。同時，如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這些特徵也體現出框架效應的非穩定性，在變化的資訊和社會環境中，這種效應可得到強化也可得以減弱。

這些基本觀點為進行新聞架構效應的研究承襲，但是，因為場景和框架特性不同，它們無法被簡單地套用。研究者們考察的新聞架構效應包括對新聞事件或議題的思考內容 (如：Brewer & Gross, 2005; Lau & Schlesinger, 2005; Price et al., 1997; Valkenburg et al., 1999)，因果解釋 (如：Iyengar, 1990, 1991)，對政策及其制定者的態度 (如：Haider-Markel & Joslyn, 2001; Iyengar, 1991; Jacoby, 2000; Kinder & Sanders, 1996; Nelson et al., 1997)，思考與決策的路徑 (如：Chong, 1996; Shah et al., 1996)，以及討論某議題所使用的語言及其組織 (如：Brewer, 2002; Druckman & Nelson, 2003; Simon & Xenos, 2000) 等。

儘管對新聞架構效應的研究多不勝數，學者們對這種效應產生的心理機制卻仍然眾說紛紜。原因在於，很多學者並沒有從理論整合的角度提出並檢驗架構效應。根據前一節對架構的概念分析，我們可以將目前文獻中對產生新聞架構效應的心理機制的分析整合為如下理論陳述 (參見 Pan & Kosicki, 2005)：

架構效應產生的一個必要條件是不確定性 (指外在的資訊環境) 或模稜兩可 (指內在的心理狀態，如對有爭議議題持可能相互矛盾的看法，或應用不同的原則/價值觀導致相互衝突的推理結果)。在此條件下，文本中組織資訊/內容的框架會起到澄清問題、理順思路、組織想法的作用。但另一必要條件是，文本的陳述邏輯一致，也就是說沒有多個框架的重疊，也沒有框架表達的模糊。具有這一特徵的文本，啟動 (activate) 文本接收者記憶儲存 (以語意相關的網絡 [semantically associated network] 為結構) 中與該框架語意相關的認知元素。架構效應是對被啟動認知元素的應用 (Price & Tewksbury, 1997)。應用的形式會因應具體場景而不同：

- (1) 如果被啟動的認知元素是具有組織思考的原則，或這些元素之間已有穩定的語意關聯 (associative paths)，那麼，文本接收者的認知框架 (schema) 與文本框架比較一致，直接的架構效應就可能產生；
- (2) 如果被啟動的認知元素是具體 (抽象層次太低，不足以起到邏輯

推理前提的作用)而且內涵單一的概念，或者說在一個人的認知體系中這些認知元素之間缺乏穩定的語意關聯，文本的框架就有可能被用來組織這些元素(即建構其關聯)，並由此產生架構效應(Simon, 2001)，但其是否發生，要看條件，包括文本接收者的意識形態取向，所面臨問題對他(她)的重要程度，他(她)對文本中的框架的適用程度、表達該框架的言說者的可信度等的判斷，大的資訊環境內是否有其他框架等等(Chong, 1996; Druckman, 2001; Druckman & Nelson, 2003)；

- (3) 在多個適用的認知元素被啟動的情況下，文本框架會影響文本接收者對這些元素的重要程度的衡量，以及思考所面臨問題的關聯程度的判斷，並因此安排(或重新安排)認知元素間的結構，形成清晰思路(Nelson et al., 1997)，文本由此間接地產生架構效應。

並不是所有這些理論觀點都已經得到了實證的檢驗。但是，它們概括了目前文獻中積累的實證觀察。並且這個概括符合架構即組織對現實的理解和經驗這個基本定義，將架構效應與學習效應和說服效應區別開來(Pan & Kosicki, 2005)：學習效應以獲取資訊或認知元素為特徵，說服效應以形成或改變態度為核心，二者都可受架構的影響，但三者是不同的心理現象。今後的研究需要從這個陳述中延引出可證偽的具體假設，以檢驗其中尚未被充分檢驗的理論觀點。

架構與話語行動

在分析「架構效應」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回到架構分析的核心命題，即公共生活中的意義建構，並回答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中，架構的話語權力是如何分佈的？架構作為一種話語實踐，與一個社會的政經結構如何勾聯？由此形成的話語實踐及其結構有什麼內在的邏輯傾向(或走向)？在此條件下產生的架構效應對我們公共生活的內容、對我們如何展開公共生活有何意義？

為回答這些問題，顯然，我們需要將文本分析、架構效應分析與行動者建構、傳佈和接收話語的社會實踐(包括社會運動)結合起來。文本

分析需要區分不同的話語建構者，也就是說，要考察誰說了什麼，對誰說的，在什麼場合，如何說的，以什麼社會結構關係為條件，產生了什麼效應；架構效應分析不僅要考察認知層面的表現，而且要考察話語層面的表現，因為，框架效應不僅在於人們怎麼運用某框架組織認知，而且在於他們將如此組織的認知外化於話語表達。

有三種分析途徑可以說明這個架構分析應當遵循的軌跡。第一種是甘姆森分析「話語包」的理論邏輯。他認為，不同社會行動者在話語的領域發生交鋒，圍繞一系列社會議題，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贊助」(sponsor)——即建構、包裝、宣導、鼓吹、擴散——他們的話語。當然，他們希望其他人能接觸到他們的話語，並成為該話語的支持者。按照這個邏輯，甘姆森所展開的話語分析包括了對不同社會群體、行動者的區分，考察他們之間的「對話」、爭鬥或結盟 (Gamson & Modigliani, 1989; Meyer, 1995)。他的分析以及其他採取類似理論取向的分析 (Hilgartner & Bosk, 1988)，令我們通過架構的分析視角，考察一個議題在特定歷史時期具有的「議題文化」(issue culture)，即關於它的話語的總體構成。採用這種途徑，我們也可以將意識形態效應 (ideological effects) 落實在這樣的話語構成及其建構過程當中 (Gitlin, 1980)。遵循同樣的邏輯，我們可以解讀社會運動的組織與動員過程當中不同框架的擴展、延伸、結盟和整合 (Carroll & Ratner, 1996; Gerhards & Rucht, 1992; Jenness, 1995; Snow & Benford, 1992; Snow, Rochford, Worden, & Benford, 1986)，以及對官方或主導意識形態的解構和顛覆 (如：McCaffrey & Keys, 2000; Mooney & Hunt, 1996)。社會運動其實就是一種話語實踐。

第二種分析途徑是考察新聞價值的作用 (Price & Tewksbury, 1997)。假設新聞從業者是具有同一職業意識形態的專業人士，新聞價值是從業者通常組織資訊、製作新聞報導所採取的視角。根據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呈現新聞報導如何在新聞中架構個人的關注，將它們社會化或公共化 (Iorio & Huxman, 1996)。區分新聞再現中的不同言說者，研究者能夠確認新聞中所體現的各利益群體所「贊助」的框架，以及新聞從業者根據自己的專業思路而形成的框架 (Ferree et al., 2002; Terkildsen, Schnell, & Ling, 1998)。展現新聞再現所獨具的框架，以及它們與新聞源和報導對象的框架如何相互交叉和滲透，我們能夠觀察到新聞的社會建構過程及

其結構 (Tuchman, 1978) 如何沉澱在新聞的文本當中，並因此將公共話語生產中的政治經濟脈絡和邏輯落實在對文本構成的考察當中 (Gitlin, 1980)。

第三條分析途徑是考察架構效果在公眾話語建構中的體現，即考察架構效應在話語範疇的呈現。研究顯示，社會行動者運用一定的框架組成自己的話語，採取特定的話語策略。這些框架可能來自生活世界中的「常備知識」(Schlesinger & Lau, 2000)，可能綜合了源自不同領域的話語資源 (Gamson, 1992)，也可能來自某種信念 (Benford, 1993)，還有可能直接來自新聞媒體 (Brewer, 2002; Gitlin, 1980; Simon & Xenos, 2000)。該途徑的研究具有三方面的理論價值：第一，架構效應並非孤立的個人認知過程所產生的結果，通常，它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形成；第二，架構效應並非僅僅表現為認知內容與結構的差異和變化，還體現在公共生活的參與中話語表達 (包括內容、語彙、結構) 的差異和變化 (Pan & Kosicki, 2001)；第三，架構效應並非是具有話語權的精英對大眾的單向灌輸，而是在特定政治經濟環境內的公共商議 (public deliberation) 過程中，影響話語的爭鬥、交叉、分化、結盟等交往形態的一種途徑 (Druckman & Nelson, 2003; Pan & Kosicki, 2001, 2005)。正如有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公眾有能力，而且實際從事對精英話語的解構，並形成在特定條件下展開集體行動、社會運動的政治意識 (Gamson, 1992)。

走向架構分析的中層理論

上述討論提出了將「思」、「言」、「行」相整合的一個理論取向，它將架構看作是這樣一個過程：在社會交往中，人們通過話語的途徑，形成並交流對現象的認知，建構共享的話語環境 (discursive environment)，使得公共生活得以展開。因此，架構分析是有別於政治經濟學和意識形態霸權等宏觀社會理論，但是應用了這些理論，並以此發展「中層理論」(Merton, 1967) 的一個研究領域。

這個觀點還可再加說明。在吉特林 (Gitlin, 1980) 的分析中，「傳媒框架」是一個連接意識形態霸權理論與經驗現象的橋樑概念。它上連構成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基本概念和分類體系，下接新聞生產過程中的組織邏

輯、行動規範、和工作程式。使用「傳媒框架」裁選現實並將其呈現於傳媒的過程就是實現意識形態霸權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不是個單向的過程。意識形態霸權，吉特林指出，通過「由一系列社會活動和體制秩序形成的複雜網絡」而展開，通過統治者發起並執行、經由被統治者的情願合作而實現 (p. 10, pp. 253–254)。構成媒介框架的是一些被自然化了的「常識」(common sense)，並體現在反映這種常識的行事「常規」(routine) 當中。既如此，在一定時刻，「常規」可能無法有效運作，「常識」可能受到挑戰 (pp. 252–282)，社會運動在形成這種挑戰、形成議題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Benford & Snow, 2000; Hilgartner & Bosk, 1988)。社會運動組織如何扮演這樣的角色，如何以架構作為運動的策略，應當在架構分析的視野範圍內。

在另一宏觀領域，已經有學者開始實證地考察公共商議過程中架構的角色 (Callaghan & Schnell, 2001; Druckman & Nelson, 2003; Simon & Xenos, 2000)。在理論層面，有的學者 (Pan & Kosicki, 2001) 指出，架構其實是商議參與者採用的策略性話語行動。不同行動者，由於在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不同，利用媒體運作規律的知識、技能和熟悉程度不同，組織、傳播話語的技能不同，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理念在特定輿論環境(或議題文化)中產生共鳴的潛力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架構能力。這樣的分析將商議民主理論的抽象原理，下移到了對具體政策議題的討論這個層面，將對商議民主實踐的批判落實在歷史地分析政治經濟秩序當中。這樣的理論視野，幫助我們理解在民主政治中，一個公共議題如何得以建構、公共生活如何得以展開。

結束語

雖然說目前運用架構分析語匯的學者，主要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內孤立耕耘，倘若超越這些孤島，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在做相互補充、豐富的研究。看到這一點只是第一步，要將此認識表達成為一個邏輯一致、結構簡約、具有解釋或詮釋能力的理論，絕非易事。我清楚自己的局限，所以沒有將此作為寫作本文的目標。我的目標是顯示不同領域間的相互關聯，並試圖通過澄清架構分析的核心命題和基本邏輯，對文獻進行力

所能及的整合。我希望本文描繪了架構分析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輪廓，陳述了該領域的理論脈絡和連接。

按照本文的觀點，哪些是架構分析未來特別需要研究的問題呢？上述討論已經點到了一些問題，我在這裏將它們綜合如下，並以此結束本文：

第一，進一步的研究需要按照話語建構的理論邏輯，完善分析文本的方法，並運用這樣的方法，考察各種不同的聲音如何在新聞文本中得以體現。簡單地說，我們需要超越對新聞再現脫離話語實踐的描述。

第二，進一步的研究需要檢驗心理機制理論敘述中還沒有得到驗證的元素，尤其需要在「思」、「言」、「行」一體的過程中檢驗它們，考察在不同框架下，文本、人們的認知、他們的資訊搜索 (information seeking) 和組織如何互動。

第三，進一步的研究需要考察架構對公共商議過程的結構作用，包括一個框架如何在議題內容、討論範疇和語言、參與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等方面建構一場公共商議活動；在什麼條件下，多個框架的同時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特定形態的交鋒，會導致商議的成功或瓦解。

第四，隱含在本文討論中的是網絡的概念，包括記憶作為語意相關的網絡、話語作為指意元素構成的網絡、不同話語體系相關聯的結構網絡，和話語者的社會關係網絡。這些不同範疇的網絡如何互動？架構是否意味著建立這些不同網絡的某部分間的特定組合？目前尚沒有架構研究提出並探討這些問題，但已有的關於傳播網絡與日常政治討論的研究顯示 (Huckfeldt, Johnson, & Sprague, 2004)，這應當是極有理論潛力的一個研究課題。

第五，隨著互聯網在社會生活中的滲透，我們亟需考察通過互聯網展開的資訊呈現、搜索和製作活動如何一體化，如何因此使架構過程更加多元，使框架的區分、連接、拓展、解體以不同形態發生，並因此而影響公共商議的內容、結構和效果 (Price, Nir, & Cappella, 2005)。對於研究者來說，互聯網也許給我們提供了展開實地試驗 (field experiment) 的平台，令我們有可能在實際生活場景下考察「思」、「言」、「行」的動態整體。

參考文獻

- 陳家剛(編)(2004)。《協商民主》。上海：三聯書店。
- 鐘蔚文、臧國仁、陳韻如、張文強、朱玉芬(1993)。〈新聞的框架效果〉。臧國仁(主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一九九三年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文彙編》(頁243–256)。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研究中心。
- Barsalou, L. W. (1992). Frames,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fields. In A. Lehrer & E. F. Kittay (Eds.),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s: New essays in semantic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 (pp. 21–74).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Bateson, G. (1955). 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 I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pp. 177–193).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
- Benford, R. D. (1993). “You could be the hundredth monkey”: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95–216.
- Benford, R. D., & Snow, D. A.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 Brewer, P. R. (2002). Framing, value words, and citizens’ explanations of their issue opinio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 303–316.
- Brewer, P. R., & Gross, K. (2005). Values, framing, and citizens’ thoughts about policy issues: Effects on content and quant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26, 929–948.
- Burke, K. (1989). *On symbols and society* (Ed. and Intro. by J. R. Gusfiel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llaghan, K., & Schnell, F. (2001). Assessing the democratic debate: How the news media frame elite policy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 183–212.
- Cappella, J. N., & Jamieson, K. H. (1997).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lston, D. E., & Smith, E. R. (1997). Principles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 In E. T. Higgins & A. W.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184–210).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Carroll, W. K., & Ratner, R. S. (1996). Master framing and cross-movement networking in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 601–625.
- Chandler, D. (2002). *Semiotics: The basics*. London: Routledge.
- Chong, D. (1996). Creating common frames of reference on political issues. In D. C. Mutz. (Ed.), *Political persuasion and attitude change* (pp. 195–224).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D’Angelo, P. (2002). News framing as a multiparadigmatic research program: A response to Entm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870–888.
- de Vreese, C. H., Peter, J., & Semetko, H. A. (2001). Framing politics at the launch

- of the Euro: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mes in the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 107–122.
- Druckman, J. N. (2001). On the limits of framing effects: Who can fram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3, 1041–1066.
- Druckman, J. N. (2002). The implications of framing effects for citizen competence. *Political Behavior*, 23, 225–256.
- Druckman, J. N., & Nelson, K. R. (2003). Framing and deliberation: How citizens' conversations limit elite influ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 729–745.
-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51–58.
- Entman, R. M. (2004). *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Polity Press.
- Ferree, M. M., Gamson, W. A., Gerhards, J., & Rucht, D. (2002). *Shaping abortion discourse: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isch, D. (1993). Reasons for framing effec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4, 399–429.
- Gamson, W. A. (1988).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11, 161–174.
- Gamson, W. A. (1992). *Talking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mson, W. A., & Lasch, K. E. (1983).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S. E. Spiro & E. Yuchtman-Yaar (Eds.), *Evaluating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pp. 397–41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Gamson, W. A., & Meyer, D. S. (1996).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D. McAdam, J. D. McCarthy & M.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p. 275–2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1–37.
-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erhards, J., & Rucht, D. (1992). Mesomobilization: Organizing and framing in two protest campaigns in West Germa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555–595.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Two: Lifeworld and*

-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Haider-Markel, D. P., & Joslyn, M. R. (2001). Gun policy, opinion, tragedy, and blame attribution: The conditional influence of fram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3, 520–543.
- Hilgartner, S., & Bosk, C. L.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problems: A public arenas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53–78.
- Huckfeldt, R., Johnson, P. E., & Sprague, J. (2004). *Political disagreement: The survival of diverse opinions with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orio, S. H., & Huxman, S. S. (1996). Media coverage of political issues and the framing of personal concer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 97–115.
- Iyengar, S. (1990). Framing responsibility for political issues: The case of poverty. *Political Behavior*, 12, 19–40.
- Iyengar, S. (1991). *Who is responsible?*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coby, W. W. (2000). Issue framing and public opinion on government spen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750–767.
- Jeness, V. (1995). Social movement growth, domain expansion, and framing processes: The gay/lesbian movement and violence against gays and lesbians as a social problem. *Social Problems*, 42, 145–170.
- Jones, S. K., Frisch, D., Yurak, T. J., & Kim, E. (1998). Choices and opportunities: Another effect of framing on decision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1, 211–226.
- Jou, J., Shanteau, J., & Harris, R. J. (1996).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iew of framing effects: The role of causal schemas in decision making. *Memory & Cognition*, 24, 1–15.
- Kahneman, D. (2003). A perspective on judgment and choice: Mapping bounded ration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8, 697–720.
-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63–291.
-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84).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341–350.
- Kellstedt, P. M. (2000). Media framing and the dynamics of racial policy pre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239–255.
- Kinder, D. R., & Sanders, L. M. (1996). *Divided by color: Raci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ideal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ühberger, A. (1995).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 new look at old proble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2, 230–240.
- Kühberger, A. (1998). The influence of framing on risky decisions: A meta-analysi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5, 23–55.
- Lau, R. R., & Schlesinger, M. (2005). Policy frames, metaphorical reasoning, and support for public polic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26, 77–113.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e, C. C., Chan, J. M., Pan, Z., & So, C.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vin, I. P., Schneider, S. L., & Gaeth, G. J. (1998). All frames are not created equal: A typology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framing effec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6, 149–188.
- Macrae, C. N., & Bodenhausen, G. V. (2000). Social cognition: Thinking categorically about other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93–120.
- McCaffrey, D., & Keys, J. (2000). Competitive framing process in the abortion debate: Polarization-vilification, frame saving, and frame debunking.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1, 41–61.
- McCombs, M. (1997). New frontiers in agenda setting: Agendas of attributes and frames. *Mass Comm Review*, 24(1 & 2), 32–52.
- Merton, R. K. (1967). 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 In *On theoretical sociology: Five essays, old and new* (pp. 39–72). New York: Free Press.
- Meyer, D. S. (1995). Framing national security: Elite public discourse on nuclear weapons during the Cold Wa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2, 173–192.
- Miller, M. M. (1997). Frame mapping and analysis of news coverage of contentious issues. *The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4(4), 367–378.
- Miller, M. M. (2001). The spiral of opportunity and frame resonance: Mapping the issue cycle in news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S. D. Reese, O. H. Gandy, & A. Grant (Eds.),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pp. 107–121).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Miller, P. M., & Fagley, N. S. (1991). The effects of framing, problem variations, and providing rationale on cho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7, 517–522.
- Minsky, M. (1975).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 In P. H. Winston (Ed.), *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 (pp. 211–277). New York: McGraw-Hill.
- Mooney, P. H., & Hunt, S. A. (1996). A repertoire of interpretations: Master frames and ideological continuity in US agrarian mobilizatio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 177–197.
- Nelson, T. E., & Oxley, Z. M. (1999). Issue framing effects on belief importance and opin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1, 1040–1067.
- Nelson, T. E., Oxley, Z. M., & Clawson, R. A. (1997). Toward a psychology of framing effects. *Political Behavior*, 19, 221–246.
- Neuman, W. R.,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n, Z., & Kosicki, G. M.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55–75.
- Pan, Z., & Kosicki, G. M. (2001). Framing as a strategic action in public deliberation. In S. D. Reese, O. Gandy and A. Grant (Eds.),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pp. 35–66). Mahwah, NJ: LEA.

- Pan, Z., & Kosicki, G. M. (2005). Framing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citizenship. In S. Dunwoody, L. B. Becker, G. M. Kosicki, D. McLeod (Eds.), *The evolution of key mass communication concepts* (pp. 167–207).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Price, V., Nir, L., & Cappella, J. N. (2005). Framing public discussion of gay civil un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9, 179–212.
- Price, V., & Tewksbury, D. (1997). News values and public opinion: A theoretical account of media priming and framing. In G. A. Barnett & F. J. Boster (Eds.),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Vol. 13* (pp. 173–212). Greenwich, CN: Ablex.
- Price, V., Tewksbury, D., & Powers, E. (1997). Switching trains of thought: The impact of news frames on readers' cognitive respons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4, 481–506.
- Reese, S. D. (2001). Prologue — Framing public life: A bridging model for media research. In S. D. Reese, O. H. Gandy, Jr., & A. Grant (Eds.),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pp. 7–31).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Rothman, A. J., & Salovey, P. (1997). Shaping perceptions to motivate healthy behavior: The role of message fram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 3–19.
- Schank, R. C. (1990). *Tell me a story: A new look at real and artificial memo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 Scheufele, D. A. (1999). 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 103–122.
- Schlesinger, M., & Lau, R. R. (2000). The meaning and measure of policy metapho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611–626.
- Schutz, A. (1962). *Collected papers Vol.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Vol. 2,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Ed. and intro. by M. Natanson). The Hague: M. Nijhoff.
- Semetko, H. A., & Valkenburg, P. M. (2000).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2), 93–109.
- Shah, D. V., Domke, D., & Wackman, D. B. (1996).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Values, framing, and voter decision-making strategi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509–560.
- Simon, A. F. (2001). A unified method for analyzing media framing. In R. P. Hart & D. R. Shaw (Eds.), *Communication in U.S. Elections* (pp. 75–89). Lanham, M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Simon, A., & Xenos, M. (2000). Media framing and effective public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 363–376.
- Smith, E. R. (1998).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memory. In D. T. Gilbert, S. T. Fiske, & G. Lindsey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Vol. 1* (pp. 391–445). Boston, MA: McGraw-Hill.
- Snow, D. A., & Benford, R. D. (1992).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n A. D. Morris & C. M.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pp. 133–155).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 A., Rochford, E. B., Worden, S. K., & Benford, R. D. (1986). Frame

-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64–481.
- Steinberg, M. W. (1998). Tilting the frame: Considerations on 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from a discursive turn. *Theory and Society*, 27, 845–872.
- Takemura, K. (1994). Influence of elaboration o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8(1), p. 33.
- Tankard, J., Jr. (2001). The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edia framing. In S. D. Reese, O. H. Gandy, & A. Grant (Eds.),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pp. 95–106).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Taylor, S. E., & Crocker, J. (1981). Schematic bases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E. T. Higgins, C. P. Herman, & M. P. Zanna (Eds.), *Social cognition: The Ontario symposium* (pp. 89–134). Hillsdale, NJ: LEA.
- Terkilden, N., Schnell, F. I., & Ling, C. (1998). Interest groups, the media, and policy debate 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message structure, rhetoric, and source cu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5, 45–62.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8).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In D. E. Bell & H. Raiffa (Eds.), *Decision making: Descriptive, normative, and prescriptive interpretations* (pp. 167–1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lkenburg, P. M., Semetko, H. A., & Vreese, C. H. (1999). The effects of news frames on readers' thoughts and recal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 550–569.
- van Dijk, T. 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註釋

1. 在我所接觸到的中文傳播學文獻中，「框架」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台灣學者鐘蔚文、臧國仁等 (1995) 教授的一篇論文，題為「新聞的框架效果」。我在這裏將「frame」譯作「架構」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英語文獻中，「frame」這個概念既作名詞，也作動詞。作為一個名詞，以「框架」表示頗為恰當；作為一個動詞，frame表達的是以話語方式展開的社會建構過程，「框架」一詞顯得過於靜止，缺乏應有的動態和容量，因此，我採用「架構」，並用「架構分析」來指代整個的研究領域，以突出社會建構主義的元理論 (meta-theoretical) 取向。
2. 我在本節將「傳播」和「交往」互換使用。象徵互動的視角下的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s) 就是傳播活動，但「傳播」一詞過於突出少數對多數以及資訊擴散的含義。對社會互動意義上的傳播，在中文表達上用「交往」更恰當。此

外，用「交往」便於表述哈貝馬斯的觀點，因為他的「交往行動理論」已經有了約定俗成的中文翻譯。

3. 本文用「公共生活」特指民主社會的公民和社區成員實現其權利的各項活動，包括參與公共利益 (public interests) 的形成和表達以及公共議題的確認和討論，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監督政府，參與社會運動或其他集體行動等。用國家—社會的兩分法框架看，公共生活在市民社會內展開，是人們「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4. 對於哈貝馬斯的理論與社會建構主義的關聯，我必須另文展開。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哈貝馬斯對「生活世界」、系統 (system)、二者之脫節、「交往行動」、交往理性之可能，以及交往行動在生活世界內的社會整合作用等的論述，都從現象學的社會學中汲取了很多思想資源，也是對它的巨大發展。架構分析之運用到人們的公共生活，包括政治交往和政治參與過程，得益於哈貝馬斯的理論貢獻。
5. 中國學者(陳家剛，2004)將之翻譯為「協商民主」。我在此譯為「商議」是為了突出規範理論意義上的要求，即deliberation不應當包括遵循非「交往理性」原則的相互妥協和討價還價，強調的是以哈貝馬斯意義上的交往行動為基本模式的討論。
6. 因此，戈夫曼稱這樣的框架是「初始的」(primary)。這個形容詞也包含了主要的、基本的等含義，這些不同的含義表達了框架在一個文化的常識體系中的地位以及不同框架之間在此體系中的相互關聯。在戈夫曼的分析中，這些不同的含義並沒有得到清晰的分辨。因此，在作一般理論概念使用時，我們就對「框架」不加任何定語。
7. 認知和社會心理學中在這些方面的文獻浩如煙海，為了簡便起見，我在這裏只引用對這些文獻迄今為止比較完善而且權威的綜述。
8. 政治心理學家Druckman區分了包括對等 (equivalency) 與側重 (emphasis) 這兩種架構方法，決策心理學家Küberger區分了改變參照狀態 (reference point) 與後果顯著程度 (outcome emphasis) 的架構方法，Levin等心理學家區分了改變目標 (goal)、特徵 (attribute)、風險選擇 (risky choice) 的架構方法。
9. 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因襲了凱尼曼和特威爾斯基提出的風險選擇框架的基本要素，即組織和呈現「客觀」的資訊；不同框架包含的資訊在概率意義上具有對等的預期值。但後一標準，在新聞架構分析中無法得到精確滿足，因為我們面對的架構對象遠比任何已經提煉的、孤立的決策情景要複雜。通常，學者們根據這後一條標準，強調相互比較的框架之間資訊內容相當 (Druchman, 2002)。我在這裏不包括決策科學領域的框架，也不包括由此引發的說服研究領域內的框架。

《傳播與社會學刊》，第一期 (2006)

10. 本文不可能討論文本分析或話語分析的一般理論和原則。如有需要，讀者可參閱2003年中文版的梵·迪克的《作為話語的新聞》，費爾克拉夫的《話語與社會變遷》，以及Daniel Chandler (2002) 的入門書，*Semiotics: The Basics*。
11. 因為這些領域的實證研究數量龐大，我在這裏僅引用我所看到的最系統、權威的文獻綜述，包括對文獻的量化綜述 (meta-analysis)。